

1909 ~ 1991



新聞教育的傳教士

馬星野

◎陳百齡／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兼傳播學院副院長

撰文



馬星野 1909 年生於浙江省平陽縣三都陳畝村的叢桂草堂，其家族以書香傳家，族人也都獻身教育事業。馬星野十四歲那年考入浙南六縣人才薈萃之地—溫州的浙江省立十中，當時名滿全國的新散文體作家朱自清即是馬星野的導師兼國文教師，大學時馬星野又與朱自清在校園重逢，再續師生緣，始終維持亦師亦友的關係。

馬星野自政校畢業後，赴美留學攻讀新聞，受 Williams 博士「從做中學」的理念影響，返國任教於政校時，帶領學生創辦了南京《中外月刊》雜誌和湘西《芷江日報》。「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是他對於新聞事業的理想，而起草《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則，更是他倡導傳播倫理的重要作為。馬星野在國府遷臺後雖不再執教鞭；但許多新聞工作者都是他的學生或再傳弟子。他一生致力於新聞教育和媒體實踐，可謂臺灣新聞教育的先驅和媒體倫理的傳教士。



■馬星野先生

壹、書香傳家的馬氏家族

馬星野 1909 年（清宣統元年）農曆 9 月 13 日寅時，生於浙江省平陽縣三都陳畝村的叢桂草堂（馬星野，1955）¹。譜名允偉，入學後取單名偉。在美求學時，在報刊發表文章，取杜工部詩「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中的星、野二字筆名，以秋天滿天繁星的平野，喻偉大闊曠之意。名隨文傳，遂以筆名傳世。

馬氏家族以書香傳家，族人也都獻身教育事業。祖父馬維藩（字蓮屏）皓首窮經，縣中通儒多出自其門下；由於馬家故居依山傍泉，靠近鄉中首屈一指的山泉，當地人因稱蓮屏公為「第一泉邊第一儒」（馬星野，1980/10/20）。

1. 浙江省平陽縣三都陳畝村即今浙江省平陽縣宋橋鎮湖嶺村，叢桂草堂為馬馬道屏故居堂號。參見：馬星野（1955）。**生平簡記（上）**，手稿，頁 1。

大伯馬毓騏（字筱屏）十三歲舉秀才，官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民初返國後，曾任省立十中校長和多所書院院長。父親馬毓麟（字敏中）十四歲入洋，治學嚴謹，擔任書院教席。父子三人加上族中的堂兄弟馬毓驊（字翊中）、馬毓驤（字季洪）皆出自平陽三都陳畧村，時人譽為「馬氏五常」（馬允元，1994）。

馬星野是家中長孫，幼時由祖父一手帶大。祖父儘管雖愛孫如命，管教卻十分嚴格。他日後回憶：「每於晨昏寒暑，祖父督教甚嚴，故四書、左傳、詩經、杜詩等，十歲之前均已成誦。」（馬星野，1980/10/20）。五歲起，先後就讀平陽縣立毓秀小學，以及平陽第一高等小學。高小畢業之後，又先後在堂叔毓驊主持的扶風書院、以及另一堂叔父毓驤任教的潁川書院書院就讀，國學基礎日益深厚，被稱為馬家後起的千里駒（馬允元，1994）。

貳、艱辛刻苦的求學歷程

馬星野十四歲那年考入溫州的浙江省立十中。這所學府是浙南六縣人才薈萃之地。民初著名學者如朱自清、謝玉岑、馬公愚、劉延陵等人均曾任教于這所學校。擔任馬星野導師兼國文教師的朱自清，是當時名滿全國的新散文體作家。朱自清十分賞識馬星野的文才，一次朱自清在點評馬星野文卷時，引用李商隱詩「何事荊臺十萬家，獨教宋玉擅才華」，將他比擬為戰國時代的才子宋玉（馬允元，1994）。朱自清鼓勵馬星野多寫多讀，要他在課外多接觸文學書籍。朱自清寫作甚力，每寫出一篇新文章、或每接到稿費買到新書之時，總不忘和這個學生分享。1925年馬星野初中畢業，升入溫州十中師範科，只讀一年，便以同等學歷考入廈門大學社會系，家中接濟中斷，陷入絕糧的窘境，每日僅能熬粥糊口度日。正一籌莫展之時，朱自清寄來四十大洋，得以及時解圍。事後方知，這筆救命錢原來出自恩師「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稿費」！（馬星野，1978/05/17；馬星野，1992）²

2. 參見：馬星野（1978/05/17）。「朱自清研究」序，中央日報，副刊。以及「回首少年時」，吉人（主編），馬星野先生紀念集（頁330），臺北市：中央日報。

後來馬星野和朱自清在清華大學校園重逢，再續師生緣，始終維持亦師亦友的關係。馬星野認為，求學過程當中能夠碰上朱自清是一件幸運的事，不僅因為「朱先生是一塊美玉，他的一句詩，一夕話，都有值得長久回味的價值……」（馬星野，1978a，頁8）更令人感念的是為人師表的極致：「朱先生一生在窮苦中過日子，除了文學創作，除了學術研究，除了全心全力為下一代服務，從不為自己打算」（馬星野，1978a，頁8）。

馬星野在廈門大學僅讀了兩個月，便因學校發生罷課學潮、校務停頓、無書可讀而離開廈大（馬星野，1978b，頁28）。1927年春，國民革命軍北伐抵達南京，設立中央黨校。馬星野聞訊，與十數位同學同赴應試獲得錄取。當時黨校以「養成革命繼起的青年」為辦學目標，對於學術研究也很認真，教授陣容包括方東美、趙蘭坪、王世杰、羅家倫等人，均為碩學俊彥（馬星野，1978b，頁28）。馬星野在校期間，兼校長蔣介石第一次來校向學生講話，校方指派他隨侍速記，講稿呈上後，蔣大為欣賞，命他主編校刊（馬星野治喪委員會，1992）。1928年五月，馬星野以第一名畢業。這段黨校教育為期僅八個月，馬星野自述：「一生之思想，於此短時間內鑄成定型」（馬星野，1953，頁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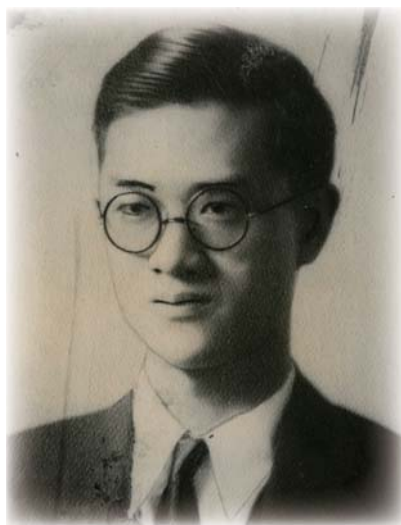
次年中央黨校改名中央政治學校。馬星野留校擔任同學會總幹事，受到兼校長蔣介石和羅家倫等人賞識。1928年冬天，實際負責政校校務的羅家倫，奉派北調清華大學校長。羅校長邀請馬星野擔任校長室秘書，並特准他選讀清華課程，馬星野一面編輯《清華校刊》，一面選讀英國文學和社會問題的相關課程。次年黨校改組為政校，校方電召馬星野返校服務，於是他辭去清華工作，回到南京的紅紙廊。他和陶希聖、薩孟武等政校教授編輯《政治與民意》雜誌，首度涉獵期刊編輯。

參、步入新聞領域的起點

1930年冬天，政校選派畢業生出國深造，馬星野以第一名錄取。他原本志願是出國攻讀教育，但在留學前夕，兼校長蔣介石召見，告以未來黨國亟需宣傳人才，希望他改讀新聞，「為黨的新聞事業儲備人才」（馬星野，

1952/04/12)。馬星野先前辦過報刊，也有興趣研究新聞，於是經校方准許，改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

創立於 1908 年的密蘇里大學，擁有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新聞學院。這所新聞學院自創設之初，就和中國保持密切關係。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當中，有兩位來自中國。其中一位是董顯光，另一位則是黃憲昭。前者在抗戰時期主持國民政府的國際宣傳工作，其後並擔任中國駐美大使；後者則在燕京大學創立中國第一個新聞系。密大校長，也是新聞學院的創院院長 Walter Williams，是一位典型的美國學術活



■ 1930 年代赴美就讀密蘇里新聞學院的馬星野

動家，極具個人魅力，在中美兩國都建立了廣泛人脈。Williams 曾經五度訪

華，在北京大學演講時，胡適親任翻譯。在 Williams 努力之下，密大和燕京大學之間多項學術合作計畫，希望把密蘇里辦學模式推廣到中國（張詠，2011/03/12）。政校送了一個電報過去，Williams 校長立即同意馬星野入學。1931 年秋天，馬星野自上海搭乘「加拿大皇后號」橫渡太平洋，轉轉來到密大所在地的哥倫比亞小城，馬星野在新聞學院附近的民宅安頓下來，先住在南五街羅傑斯家，後搬到史考特家，與新聞學院僅四個街區之遙，步行只需五、六分鐘（喬治高，1992）。馬星野入學之際，中國東北剛剛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三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揭開序幕；而美國則正處於經濟大



■ 馬星野（左）多年後重返母校密蘇里大學，和昔日師長 Shark 教授在新聞學院校舍前合影。

蕭條時期。在這一連串重大歷史事件衝擊下，馬星野不僅探索新聞的功能和意義，也因而特別關注國際政治課題。Williams 校長告訴馬星野，學新聞的人一方面要有實際經驗，一方面要有社會科學知識，另一方面還要有新聞道德與哲學。馬星野修課也依循著這個脈絡。

馬星野由大學部三年級課程開始唸起，必修課程是新聞史、新聞原理、新聞編採和評論寫作。新聞採訪課主要經由新聞學院辦的實驗報紙《密蘇里人報》實習來完成，這個課程來自於 Williams 博士的教育哲學，強調學生應該「從做中學」，亦即透過實踐、學習技能、以建構知識。馬星野顯然服膺這項哲學，多年以後，當他任教於政校新聞系，帶領學生創辦南京《中外月刊》雜誌和湘西《芷江日報》，便是秉持恩師 Williams 博士的教育哲學。

馬星野也在外系選了幾門課。其中影響他最大的是公共行政系 Middlebush 教授的國際法課程，這門課從國際關係角度出發，為馬星野提供一個理解新聞的切入點。馬星野回國後撰寫的一系列新聞論述當中，特別強調新聞自由與國際輿論的關係。其中發表在 1944 年的一篇文章〈新聞自由與世界和平〉指出：「新聞自由可以組織形成強有力之國際輿論，以此輿論來制裁侵略，來抑制戰爭之企圖，來保障和平之永固。」

在美期間，馬星野不但致力於學習各項課業，也常利用課餘時間為國內報刊撰稿，他以星野為筆名，不僅介紹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和美國政壇動態，期間也介紹美國各地民情風俗，文章多發表在上海《東方雜誌》、《申報月刊》、《申報月刊》以及天津《國聞週報》等。

1934 年春天，馬星野結束三年密蘇里大學課程。他畢業後，原準備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繼續深造，取得入學許可後，先往華府拜訪白宮、國會等機構研究美國政情。就在此時，政校發電報催促他回國服務。於是他在 1934 年 5 月從加拿大溫哥華搭乘日本皇后號郵輪返國，28 日抵達南京。返國之初，《申報》老闆史量才想方設法要留他辦報，但馬星野只在《申報》待了三個月，寫了數篇專欄文章，便又返回母校（馬星野，1955，頁 26）。此後在政校任教十四年。

肆、強調「做中學」的新聞教育

馬星野返國之初，政校尚未設立新聞系。他先在外交系開設「新聞學概論」課程。次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在政校設立新聞系。政校教務主任程天放兼任系主任（後由劉振東繼任），但系務實際由馬星野主持（馬星野，1952/04/12）。

中國最早的新聞系在燕京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復旦大學先後也都設立了新聞科系。政校則是國立大學中首先設系者。馬星野認為當時設立新聞系、培養新聞人才，因為國家發展影響最普及、時間上最快奏效的，莫過於做新聞事業。因為在那個時代，「報紙是傳達思想的最快、也最普遍的工具。而在民主政治中，建設政府監督政府收效最大影響最鉅的，也莫過於報紙。」換句話說，報紙做為傳播媒體，是國家發展的推手，而辦好一份報紙，則需要有優秀的新聞記者，新聞才能專業化，媒體組織也才能健全。因此，儘管當時新聞界並不重視新聞教育，馬星野還是選擇走上這條路。

馬星野把密蘇里的「做中學」哲學，帶進政校新聞系。在當時新聞系剛剛設立，人力物力有限，還無法辦一份學生實習報紙，但他認為新聞教育必須注重實際，必須有實習課程，所以他設立了中央政校新聞研究會，創辦了《中外月刊》雜誌，專供學生實習之用。這本刊物從主題發想到編輯、採訪到發行，均由學生一手包辦，這份月刊一直維持到抗戰爆發，政校西遷為止。新聞系第一期畢業的彭河清多年後受訪，對於當年新聞系「做中學」的經驗，印象依舊深刻（林玉花，1991）：

馬老師以美國時代雜誌（Time）為樣本，帶著新聞系學生創辦了《中外月刊》，每一期月刊，都是學生們自己找題材，自己採訪，自己寫稿，甚至於自己校對，一點一滴，揮汗編輯而成。而《中外月刊》終能發行達三千份，深受國內外佳評。

1937年抗戰爆發之後，因京滬戰事失利，政校隨國民政府輾轉西遷。政校一路從南京撤到江西牯嶺、再由牯嶺撤至湖南長沙、寶慶，最後在湘西芷江停了下來。芷江復課期間，馬星野和他的學生們辦了一份小型日報，名為《芷江



■ 1928年抗戰軍興，馬星野（前左二）隨政大新聞系輾轉遷至湖南芷江，創辦《芷江日報》，實驗「即教、即學、即做」的新聞教育哲學。圖為當時師生合照，前排起（由左至右）：徐鍾珮、馬星野、劉振東、俞頌華、俞湘文，後排起（由左至右）：黃宜威、鳳申、黃印文、葛思恩、潘煥昆。（本張圖片原件典藏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日報》。當時許多新聞系學生已經投筆從戎，留在芷江的學生不到十個人。當時瘟疫四處橫行，隨時可能遭到霍亂傳染，同時每天也飽受日軍轟炸威脅，日子非常艱難，但是這群師生卻一邊辦報、一邊上課，實驗「即教、即學、即做」的三合一學習法（馬星野，1978/10/26）。

伍、追求新聞的正義與自由

1939年政校再度西遷重慶，落腳在重慶南關的小溫泉。新聞系一度停止招生，先後改設新聞專修班（1939年）、專修科（1941年）和新聞學院（1943年），馬星野一直是其中的靈魂人物。

重慶小溫泉時期的政校新聞教育，面臨編制變動頻繁，專門師資有限，課程也非常簡略。馬星野教授新聞學、新聞史、社論寫作、報社經營及管理 etc

程，是新聞相關課程當中則較具體系和深度者。他在教學上，非常重視引導學生認識新聞事業，並且極力培養學生擔任新聞記者的熱情和信念。

馬星野在課堂上打動學生，讓他們決定日後獻身新聞事業，所依恃的，既不是便給的口才、也不是豐富的教學體驗，而是對於新聞事業的信念：一種把西方追求新聞自由的精神與東方重信尚義傳統融為一體、對新聞事業充滿熱情的理想主義。他的學生徐佳士回憶課堂上的馬老師，寫道（徐佳士，1998）：

星野老師從不滔滔雄辯，他在教室中講授新聞學時，濃重的溫州口音時常令人聽不懂，有時他自己邊講邊笑，我們瞠目之餘，只能趕快做禮貌式的回應，但是他的許多學生卻被他說服，決心終身投放大眾傳播事業。他的說服力主要來自他對新聞事業的理想主義，來自他寫下、而由我們不斷唱出的：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

「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是新聞系系歌其中兩句，這首系歌由馬星野作詞，李抱忱編曲，期許新聞系學生未來胸懷「微言大義春秋筆」、透過「筆槍與紙彈」、「誓為民族最前鋒」，反映了馬星野對於新聞事業的理想，以及他對新聞學子的殷殷期盼。當年在南溫泉入學的新聞系迎新會上，學長帶著學弟起勁地唱著這首歌，所有人都情緒昂揚，內心無不感動。當時在場的薛心鎔說：「在那舉國奮戰，抵抗外侮，遍地烽火，死裡求生的時代，有什麼能比正義之火、自由之鐘、春秋之筆，更能打動青年之心的呢？」（薛心鎔，2003，頁 31-33）。也因此，這首系歌所揭櫫的「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成為這群新聞學子的「入門誓約」，以及許多新聞系畢業生奮鬥的圭臬。

這首歌詞中充滿馬星野身為經師的期許，但更難的則是為人師，也就是身教。馬星野對於新聞信念的力行，可以從以下這個例子得見。1940 年間，一批法國殖民地官員從越南撤退，自鎮南關進入中國境內，這群官員趾高氣揚，與中國邊境官員發生衝突，結果被揍了一頓。事發後，《大公報》發表社論，認為「打得好！」打的是殖民者的頑固腦筋。這篇社論雖寫得痛快淋漓，一吐弱小民族的不平之氣。未料卻因當時戰時新聞檢查局認為抗戰急需各友邦支援、認為此文不利對法邦交，因此檢扣社論不發，第二天《大公報》社論僅保留標

題，內文一片空白。報紙開天窗的消息見報後，社會一片譁然。馬星野到重慶取得原文，交由學生謄寫，貼在政大校園內，當時人人爭相閱讀。馬星野透過這件事，用他的行動告訴學生，新聞報導縱因限於時局而遭受阻撓，但新聞記者秉持的正義，不應被抹煞（薛心鎔，2003，頁40）。

陸、實踐傳播倫理的苦行僧

1942年馬星野兼任國民黨宣傳部新聞事業處處長，但仍兼任政大新聞系主任。任職其間，起草《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則，被全國各地新聞記者公會討論通過採用。這項信條，不僅成為中國第一項記者自律規範，也成為後來新聞評議會用以評斷爭議性新聞報導的重要判準。1941年，他和中央社蕭同茲、大公報張季鸞、中央日報胡健中、世界日報成舍我等人，在重慶發起成立中國新聞學會。這是中國最早的、也是全國性的新聞產業組織。1945年在南京成立新聞記者公會，這些新設立的組織，在當時成為新聞媒體組織合作的基礎。



■ 1941年馬星野（右一）在重慶發起成立中國新聞學會，圖為學會成員和來訪的美國新聞學者 Charles Clayton（右二）、Howard Long（右三）、Raymond Nixon（右四）等人在中國新聞學會大門前合照。前左一為李元簇。

抗戰勝利後，馬星野奉命返回南京接辦《中央日報》。當時有許多自命為老報人的同行，認為馬只會教書，辦報則是外行，這些人暗地並不看好他能在南京辦報。正如他的老校長蔣介石當年率領五百軍校生東征北伐，馬星野則帶著他培養出來的政校子弟兵，試圖在戰後的首都南京殺出一條生路。從「馬老師」轉換成為「馬社長」的馬星野，也頗能讓這群生力軍充分發揮所長，打開一個新局面。馬星野這樣形容他的學生（馬之驩，1986，頁391）：

「我們有一大群青年人，全是朝氣蓬勃，說做就做，如生龍活虎，魚躍鳶飛。我出一個主意，他們立刻去做：他們比我更熱心：我興趣來時，他們比我興趣更高。因此轟轟烈烈，把一個南京《中央日報》，幹得十二分有勁，無論銷路廣告，都蒸蒸日上，不僅打破《中央日報》紀錄，亦打破所有南京報紙之紀錄」。

當時也在馬星野手下跑新聞的龔選舞（1992，頁115-116）說：「一方面，他鼓勵、甚至於縱容屬下年輕記者去盡情發掘所有稱得上新聞的新聞，一方面也聽由編輯大膽利用這些讀者關心喜愛新聞，而從不加以干涉。」這群青年記者們在政治軍事新聞方面既要和全國性大報《大公報》和《申報》一決高下，在社會新聞上，也不落於小報《新民報》和《南京人報》之後。馬星野的子弟兵們非常敢於衝撞現況，不畏權勢。



■時任南京中央日報社長的馬星野（左一），和陳果夫（中）、採訪主任陸鏗（右）合影。

在那個時代，報紙的報導或為賢者諱、或憚於權勢，對於涉及豪門皇戚的新聞，往往噤聲。然而，當時《中央日報》記者卻敢於向社會大眾揭發某些當權政要家族企業涉及不法之爭議事件。這個事件在國民黨內部會議引發爭議之後，南京《中央日報》記者設法自政府內部取得調查報告，向社會大眾揭發了這個案件。新聞見報後舉國震動，當局嚴詰消息來源，但《中央日報》上下主

管仍堅不透露消息來源（陸鏗，1997，頁 166-180）。

此外，《中央日報》也曾獨家刊出在國民大會中國大代表不滿當時東北剿共失利的譴責之聲。即使遷臺之後，仍舊繼續堅持這種「不為上位者諱」的直言作風。不僅在土地改革和開放地方自治問題上報導既詳且盡，就連蔣介石在黨內會議上對大陸退守引咎自責的談話，《中央日報》也曾經一字不漏的照實報導。1949年一篇以〈臺灣負擔不起〉的專文裡，指出當時某些政要和民意代表，對政府予取予求，吃相難看。此文一出人心大快，卻激怒許多黨國人士，要求當局查辦馬星野。但馬星野則認為，就算受到處分，「應該刊登的，還是要刊登！」

這些例子說明，馬星野的心目中，他要辦的是一家新聞報，而不是一家專門宣傳黨義黨策的黨報，所以當黨意和新聞衝突時，他採取的是「先日報，而後中央」的辦報理念。然而這種辦報作風，不免得罪人。龔選舞（1992，頁 117）說：

「這種『把報紙辦成報紙』的作風，雖然不止一次把《中央日報》辦成『第一大報』，並能綽有盈餘、上繳黨庫，一洗黨報一定平庸、也必然賠本的恥辱，但這種銳進求新，一反傳統的膽識，卻正好引人之忌，終使馬星野在辦報正臻頂峰之際，被人趕走。」

1948年底，馬星野赴臺籌設發行《中央日報》臺灣版，繼而在次年將南京《中央日報》遷到臺灣。在臺灣的馬星野，繼續擔任了四年的《中央日報》社長。1950年1952年辭去社長職，從新聞轉任國際宣傳工作。歷任中央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等職，1957年任駐巴拿馬大使。1959年回臺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1973年改任董事長，直至1985年退休。雖然他在1949年赴臺以後轉往黨政工作，而不再執教鞭，但是政府遷臺最初卅年內新聞界的骨幹，幾乎都是馬星野的學生，或者是他的再傳弟子。他們都稱馬星野為「馬老師」。

晚年的馬星野，仍相當關注臺灣新聞界的發展。1983年春天，他發表了一篇名為〈讀報觀影罪言〉的專文，文中指陳當時臺灣傳播媒體缺乏憂患意識、放棄固有文化，過於強調感官刺激（馬星野，1992，頁 199-203）。這篇文章在當時社會上雖引起一陣波瀾，然而以收視率和感官主義為主軸的商業媒體邏輯，當時已經悄悄在大眾傳播媒體組織內滋長，並在不久之後成為媒體主流。馬星野的憂心之辭終究未能夠喚起人心。



■來臺以後的馬星野（前中）雖然不再執教鞭，但是當時新聞界的骨幹，幾乎都是他的學生或再傳弟子。圖為馬星野（前左三）和政大新聞系第13屆系友（1947年畢業）的合照。前排左起：潘霖（左一）、趙春仙（左二）、周淑媛（右二）、向家（右一）、後排：周國棟（左一）、彭賢林（左二）、張英超（左三）、徐佳士（右三）、趙廷俊（右二）與彭思衍（右一）合照。

楚崧秋以「新聞界的苦行僧」形容馬星野，是指他一生從事新聞教育和媒體實踐，始終執著於理想和現實之間。他晚年無職在身以後，對朋友吐露了心中的感慨（引自吉人主編，1992，頁56）：

「如果不從事新聞實務而以教育終身，可能我的貢獻會比今天多一點，如果我有能力又有機會自己辦報，可能我對社會大眾有更多一點交代。可是今天兩者都言之已晚，不過我對於過去所做的一切，並無怨無悔，因為自己對每一次擔當的任務都曾盡了全力。」

1991年3月11日，馬星野病逝于臺灣，享年83歲。臺灣新聞界人士莫不哀悼。他的女弟子徐鍾佩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寫道：「冠蓋滿京華，這一介寒士寂寂的死在一個二等病房裏，他一生和浪費及奢侈作戰。却節節敗退，只有零落的掌聲，未曾得到應有的反應」（徐鍾佩，1992，頁103）。

※ 本文圖片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提供，馬大安女士同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權

【參考文獻】

- 林玉花（1991）。彭河清憶恩師：他熱愛新聞和國家民族，**中央日報**。
- 徐佳士（1998）。正義火、自由鐘—難忘的馬師名言。載於**國立政治大學第十三期同學畢業五十週年紀念集**（頁585）。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原刊於《中央日報》，1991/03/28）。
- 徐鍾佩（1992）。平野星落。轉載於吉人（主編），**馬星野先生紀念集**（頁100-104），臺北市：中央日報。
- 馬之驩（1986）。**新聞界三老兵**。臺北市：經世書局。
- 馬允元（1994）。馬星野情繫鄉梓。**溫州會刊**，**112**，38-39。
- 馬星野（1952年4月12日）。**馬星野自述**。馬星野手稿。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臺北市。
- 馬星野（1955）。生平簡記（上），手稿，頁26。
- 馬星野（1978a）。**書與我**。臺北市：中華日報出版社。
- 馬星野（1978b）。**《我的大學生活》第一集**。臺北市：中華日報。
- 馬星野（1978年5月17日）。「朱自清研究」序。**中央日報**，副刊。
- 馬星野（1978年10月26日）。得天獨厚，死裡逃生。**中華日報**。
- 馬星野（1980年10月20日）。我生之初。**中央日報**，副刊。
- 馬星野（1992）。回首少年時。轉載於吉人（主編），**馬星野先生紀念集**（頁327-332），臺北市：中央日報。
- 馬星野（1992）。讀報觀影罪言。轉載於吉人（主編），**馬星野先生紀念集**（頁199-203），臺北市：中央日報。
- 馬星野治喪委員會（1992）。馬星野先生行述。載於吉人（主編），**馬星野先生紀念集**（頁491-496），臺北市：中央日報。
- 張詠（2011年3月12日）。馬星野先生和密蘇里的半個世紀。「**馬星野逝世廿週年紀念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 陸鏗（1997）。**陸鏗回憶與懺悔錄**。臺北市：時報出版公司。
- 喬治高（1992）。馬星野在米蘇里。轉載於吉人（主編），**馬星野先生紀念集**（頁418-419），臺北市：中央日報。
- 楚崧秋（1992）。執著於理想與現實之間：敬悼新聞界苦行僧馬星野。轉載於吉人（主編），**馬星野先生紀念集**（頁55-59），臺北市：中央日報。
- 薛心鎔（2003）。**編輯臺上**。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 龔選舞（1992）。馬資料、馬記者和馬編輯。轉載於吉人（主編），**馬星野先生紀念集**（頁114-117），臺北市：中央日報。